

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驱动乡村空间再造的逻辑与路径

牛文涛,张越秋

(郑州大学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以“三生空间”为核心架构,在理论阐释乡村旅游低碳转型与乡村空间再造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选取台湾坪林和浙江滕头为观察对象,采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乡村旅游低碳转型驱动乡村空间再造的现实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通过驱动乡村资源配置逻辑的绿色重建,乡村空间创造产品、提供服务的生产秩序获得“低碳矫正”,乡村空间生产维度绿色转型的内在激励不断强化;通过低碳生活设施建设等乡村社区“低碳”改造,以及村民和外部旅游者等空间主体行为偏好的“低碳”矫正,乡村空间提供生活产品、居住服务及其衍生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生活秩序得到重建和优化;通过乡村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逻辑的“原生”调整,乡村空间的生态环境系统及其蕴含的生态价值属性持续优化,外部旅游者与乡村空间的多维价值认同不断强化,生态空间再造进一步赋能生产和生活空间的秩序重建过程。通过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差异化的低碳化路径,空间再造目标下的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新思路。

关键词:“三生空间”;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三产融合

中图分类号:F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4)05-0011-11

一、引言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创造美好乡村空间,既是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之一。作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乡村旅游这一产业形态对乡村“三生空间”的再生产具有直接影响^[1-2]。然而,我国乡村旅游普遍缺乏统筹规划^[3],旅游行为规范等法律文本尚不健全^[4],乡村旅游群体的低碳旅游行为偏好也尚未充分建立,导致乡村空间面临能耗高企和环境污染等现实难题^[5],乡村“三生空间”的内部冲突和秩序迷失情形日益加剧^[6]。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明确要求“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作为乡村三生空间优化与再生的关键驱动力,乡村旅游业如何高效践行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理念,持续为乡村美好生活构建进程注入活力与动力,已成为亟待探索与实践的重要现实课题。

目前,关于乡村空间再造与乡村旅游低碳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3个方面:一是乡村旅游对乡村空间再造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乡村空间再造是多因素共同约束下的综合演化过程^[7-8],通过“乡村性”保护^[9]、“权益性”再构^[10]、“差异性”重建^[11],有助于驱动乡村空间“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转型升级^[12]。学者们普遍认为,乡村旅游业对乡村“三生空间”的秩

收稿日期:2024-05-24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4.05.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L058);郑州大学人文社科优秀青年科研团队项目(2023QNTD02)

作者简介:牛文涛(1984—),男,河南济源人,郑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

E-mail:wentaoniu@zzu.edu.cn

序重建具有积极作用^[13-14],但旅游活动的“过度市场化”将引发优势功能空间之于劣势功能空间的持续冲击,并加剧了乡村空间的所谓人地关系矛盾^[2]。二是空间再造目标下乡村旅游低碳转型的产品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搭建乡村旅游的“低碳”产业链^[15],合理降低乡村低碳旅游产品价格,帮助乡村低碳旅游产品和服务逐步实现市场扩张^[16]和品牌重建,但这一过程的关键则在于充分挖掘乡村空间的“本土性”文化旅游资源^[17],打造特色低碳旅游路线,增强低碳旅游的参与性和观光性,并持续开发具备“体验性”比较优势的低碳旅游产品族,以推动乡村空间在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等多个维度实现协同发展。三是乡村旅游低碳转型助推乡村空间再造的实践路径。学者普遍认为“三生空间”再造语境下的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公众参与”这一基本路径^[18],并强调乡村低碳旅游场景打造过程中低碳化技术的应用偏好^[19]和政策支持^[18]。也有学者认为,比起单纯降碳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应当更加注重乡村产业融合和固碳降碳目标的协同推进,或将更有利于乡村空间的再生产和可持续发展^[20]。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普遍认同乡村旅游低碳转型之于乡村空间再造的积极作用,但关于乡村旅游低碳转型与乡村空间再造内在机理的系统研究仍未充分展开。因此,本文以“三生空间”为核心架构,构建乡村旅游低碳转型分析框架,在理论阐释乡村旅游低碳转型与乡村空间再造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选取台湾坪林和浙江滕头为观察对象,进一步揭示乡村旅游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空间再造的现实路径,以期能够对我国乡村旅游低碳转型与美好乡村空间再造的有序开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与乡村“三生空间”再造的内在逻辑

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是多要素共同支撑下,以乡村禀赋资源为基础,以现代旅游服务业为载体,以低碳节能减排和保护文化遗产为目的的综合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充分集合了乡村旅游的多维功能形式,并持续赋能乡村空间的秩序重建和绩效改善过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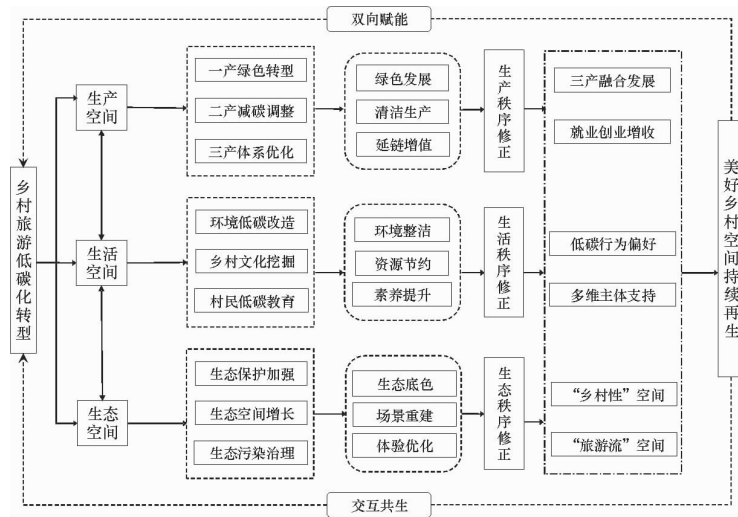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赋能乡村空间再造的逻辑框架

(一)“生产空间”维度

乡村产业碳排放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乡村空间自身创造产品、提供服务的产业体系特征,而乡村旅游低碳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减碳固碳”效能的持续提升。实

际上,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与乡村空间的产业结构优化紧密关联。通过“绿色”“节能”“减碳”等乡村资源配置逻辑的不断施行,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将持续赋能乡村一、二、三产业及其高质量融合发展。对乡村第一产业而言,其作为乡村旅游市场的重要原材料供给单元,将伴随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获得农产品生产过程“低碳转型”^[21]的重要契机,并为农产品“绿色属性”凸显和品牌重建提供逻辑可能。对乡村第二产业而言,其作为乡村旅游市场文旅文创产品以及旅游场景基础设施等的关键供给主体,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将倒逼乡村第二产业进行产品供给过程的“适应性调整”,诸如低碳技术采用偏好的逐步形成,这一演化过程将为乡村空间进一步获取“绿色”比较优势和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提供重要基础。对乡村第三产业而言,其作为乡村旅游市场“旅游流”及其衍生服务需求的直接供给主体,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过程将驱动乡村第三产业体系及其发展模式进行配套化的“绿色”调整。实际上,伴随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过程,乡村产业的空间秩序也将获得适度优化,并呈现为“初级规模的空间聚集”,诸如:致力于匹配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需求,乡村空间所衍生的多种创新业态逐步以乡村旅游运营主体为中心进行适度聚集,并持续进行自主低碳化改造,以分享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市场红利,这一过程不仅为乡村空间的“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农民群体就近就业创业增收提供了可能机会^[22]。因此,伴随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乡村三次产业及其高质量融合发展将获得重要机会,乡村空间“生产维度”的绿色转型和持续发展则将基于上述逻辑获得持续正向外部激励。

(二)“生活空间”维度

乡村空间中人与人以及人与空间的关系构成了乡村生活秩序的基本维度,而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则为乡村空间生活秩序的重构和优化提供了契机。实际上,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乡村生活秩序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其既可能大幅提升村民等居住者的基础生活条件,也可能因为过度开发、商业化以及外部旅游者行为失当等,对乡村空间生活秩序产生持续负面冲击。村民是乡村旅游业的核心利益主体,同时也是乡村旅游低碳化进程的关键参与主体,村民的低碳意识和行为偏好在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伴随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乡村空间的绿色属性持续强化,并通过低碳生活设施建设,乡村生活废弃物的排放量降低,提升了乡村生活便利度,改善了乡村生活环境。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也将驱动乡村充分挖掘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并通过培训提升当地村民低碳素养。伴随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乡村文化的振兴,村民对家乡的心理认同感和主动保护意识不断提升,进而激发村民自主选择低碳生活、低碳经营、低碳消费等低碳行为。村民营造的良好低碳氛围也将促使旅游者自觉地选择低碳旅游方式^[23]。因此,伴随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村民及外部旅游者的低碳行为偏好将逐步形成,最终乡村空间的生活秩序也将获得持续“低碳化”修正。

(三)“生态空间”维度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所提供的“乡村性”生态空间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实际上,原生态、无污染、低碳化的生态休闲旅游,由于其开发运营成本较低、整体收益较高,已经成为我国乡村旅游的重要业态之一。日本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生态属性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发展将是乡村旅游运营模式的可能方向之一。日本致力于发展生态乡村旅游,陆续颁布了《绿色采购法》等法律文本,将“环保”和“低碳”作为核心内容纳入乡村旅游规划和政策体系之中,为乡村绿色旅游市场的运营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持续创新低碳环保技术,注重保护乡村空间的原生态资源^[24],将乡村生态系统保护视作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工作。因此,乡村空间中天然、原生态的旅游场景,将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吸引物。以低碳的思维方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将有助于乡村生态空间的规范性保护,逐步推动林地、湿地等乡村生态土地面积的适

度增长,同时伴随乡村绿化面积增加、乡村产业污染集中处理、村民生活垃圾无害处理、农作物培育中化肥农药量减少等举措落实,将切实改善乡村空气质量和旅游场景品质。伴随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乡村空间的固碳能力逐步提高,乡村生态资源获得更好保护,乡村旅游的生态属性持续强化,乡村空间综合承载力不断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性”空间也将获得持续供给。因此,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通过持续生产“山清水秀”的乡村空间场景,并以鲜活的姿态呈现本土乡村旅游特色,将有助于更好满足旅游者对乡村空间的多样化体验需求,并显著改善乡村空间的综合吸引力^[15],其所引致的乡村空间“旅游流”和“要素流”的大幅增长,则为乡村旅游市场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促进乡村空间再造的实践模式

(一)“自上而下”的坪林模式

1. 发展历程

台北县坪林乡(今新北市坪林区)位于台湾省北部,茶产业和茶文化历史悠久。20世纪80年代,坪林被列入水库水源保护区,其开发受到限制,几乎完全依赖于茶产业。2006年雪山隧道开通,坪林毗邻的北宜公路重要性下降,经过坪林的人流量骤减,导致了坪林茶产业遭受冲击。2008年,为响应低碳城市号召、解决坪林发展困境,台北县政府与坪林乡共同提出发展坪林低碳观光旅游,成立了台湾省第一个低碳旅游服务中心,并组织开展了低碳坪林行动,主要包括低碳社区和低碳旅游两个项目。低碳旅游项目较为成功,通过提供低碳交通、低碳饮食、低碳资讯、低碳游览、低碳记录等多样化低碳旅游方式,“生产”和“生态”空间进一步融合,“生活”空间更加和美。在持续5个月的活动中,坪林共增加旅游人数25460人,创造约8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收益,减碳约48726公斤^[25],坪林由此成为台湾省第一个低碳旅游示范区。尽管随着地方政府补贴减少,坪林低碳旅游盛况有所减弱,但有机茶产业和低碳旅游至今仍是坪林的主要特色。

2. 成功经验

坪林选择了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低碳化路径,即“政府主动发起—乡村积极执行—公众全面参与”。通过持续彰显地方政府的行动自觉、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主体作用以及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的全面参与,坪林的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实践驱动了乡村空间的持续再生。

(1)持续彰显地方政府的行动自觉。坪林低碳项目最初由台北县政府和坪林乡共同发起,推行过程中台北县政府(包括县环保局、低碳中心)提供了较大支持。一是经费支持。台北县政府向台湾省政府申请经费用于坪林旅游低碳化。政府提供低碳交通补贴,旅游者可免费搭乘公交抵达坪林,以此鼓励公共交通。2011年开始,政府改为收取200台币报名费,但同时发放等额碳汇券,可用于坪林低碳商店消费,经费由县政府支持。二是执行支持。地方政府对景区外部交通和内部交通进行交通管制,限制汽车流量,提出了教育、观光、景观、农业产业及能源五大减碳策略,邀请企业在当地研发社区内能源系统,以促进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26],同时划定低污染排放区,制定管制自治条例,力图将坪林打造成为低碳示范社区^[27],但由于资金约束和台湾省能源技术限制未能成行。目前坪林已推进风能发电等节能设备建设,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赋能“生活”空间的影响持续显现。三是宣传支持。彼时的台湾省积极倡导节能减碳,坪林的低碳旅游活动具有开创意义,因此得到了广泛宣传。此外,地方政府连续多年举办低碳旅游节庆活动,也有助于延续坪林的低碳旅游热度。

(2)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主体作用。在坪林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过程中,台北县政府仅提供外部支持,而真正的核心动力则源自坪林乡公所等当地基层自治系统的持续引领。坪林本地

80%的居民都从事茶叶相关生产活动,但茶产业发展困境对茶农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出现了茶农自杀事件^[26]。在传统优势产业持续凋敝的情况下,发展低碳乡村旅游成为坪林突破发展瓶颈的理性选择。坪林乡公所属于当地基层自治系统,行政级别上与镇级单位相当。乡公所一方面代表居民向上为坪林争取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发挥管理作用强力推进低碳坪林项目。乡公所在营造低碳旅游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力量,不仅组织并实施了乡内垃圾清理行动,还将清理出的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28]。此外,乡公所还大力推行“封溪护鱼”的生态保护措施,以维护水域生态平衡。为了提升游客的出行便利性和体验,乡公所积极争取交通部门的支持,并自主增开了班车线路,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同时,乡公所还实施了老街翻新工程,旨在保留并强化坪林老街的历史风貌与人文特色。上述举措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再造了坪林老街等新“生产”空间,优化了河道等原有“生态”空间,是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改善乡村“三生空间”的现实印证。

(3)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的全面参与。针对坪林低碳旅游项目遇冷及茶农传统种植方式挑战生态系统碳平衡的问题,新乡村团队介入并推出“蓝鹊茶”有机茶品牌,旨在通过绿色种植与市场创新,促进茶业低碳转型,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重振坪林低碳旅游活力。新乡村团队先小范围建立试验地块并采取生态、环保的方法栽种茶叶,对接社会资金和企业,打通有机茶收购和销售渠道,解决茶农后顾之忧。同时,合作企业还可以认领茶园,并提供一些就业岗位,这对茶农转行和失业人员再就业起到帮助。在台湾新乡村团队的带动下,其他社会人士逐渐加入,开展了咖啡行业支持、“茶二代”教育、新生代茶青年培养等工作。合作企业的员工以及关注该项目的社会公众,后期则转换为旅游者前来体验采茶、制茶,感受茶文化旅游。依托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坪林茶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了品牌重建,并反哺坪林乡村低碳旅游项目的持续运营,体现了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对乡村空间再造的内生驱动。

3. 现实问题

(1) 乡村产业基础单一,外部支持依赖严重。从低碳坪林项目推行的外部条件来看,项目启动主要源于当时台湾省对低碳经济的重视和倡导,项目运转则依赖于台北县政府的资金补贴,而台北县又依赖上级拨付资金,形成了向上依赖的恶性循环。坪林低碳旅游项目的运营逻辑主要为通过旅游交通补贴(免费公交及碳汇券)吸引旅游者到来—旅游者观光(消费)—资金投入建设,而当上述补贴活动结束后,旅游者无法享受旅游成本的减免,转而需要支付门票及其他交通费用时,坪林观光人流量出现急剧下滑,商家低碳经营积极性也因此降低。实际上,乡村旅游低碳化进程普遍存在成本高、旅游者与企业参与意愿不强的问题,旅游者更倾向于不需耗费精力、不增加支出的低碳旅游方式^[29],对交通和住宿的低碳支付意愿甚至为零^[30]。此外,由于坪林低碳旅游盈利的长久模式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导致坪林旅游市场的收益链条缺乏完整性。从内部条件而言,由于开发限制,坪林产业十分单一,茶产业和旅游产业几乎是其唯二可以发展的产业。单一且脆弱的产业基础,导致了坪林依靠自身收入无法承担同等力度的活动资金支持、对外宣传费用和内部低碳运营成本。

(2) 低碳旅游产品设计相对受限,无法充分契合本土资源禀赋。实际上,如何充分挖掘乡村空间的“本土性”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特色低碳旅游路线,增强低碳旅游的参与性和观光性,持续开发具备“体验性”比较优势的低碳旅游产品族,同时合理降低乡村低碳旅游产品价格,积极延伸乡村旅游的低碳产业链,构成了乡村低碳旅游逐步实现市场扩张和品牌重建的关键所在。尽管坪林地区拥有丰富的茶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但在低碳旅游产品的策划与推出层面,其本土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并未充分实现。在坪林低碳旅游项目推行初期,低碳产品设计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交通

方式、游览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选择上,其与当地旅游资源结合的程度相对较低,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低碳化供给实则非常依赖旅游者的自觉参与。在坪林低碳旅游的产品场景中,骑行、观光等主要旅游产品与普通乡村旅游区别不大,采茶、吃茶等旅游产品与未开展低碳旅游前的情形几乎一致,坪林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中具有本土特色的“茶”与“低碳符号”的融合并未真正实现。因此,低碳旅游项目与本土资源禀赋结合的相对不足,以及具备“体验性”比较优势的低碳旅游产品族的相对缺失,成为坪林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壁垒之一。

(二)“自下而上”的滕头模式

1. 发展历程

滕头村地处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20世纪60年代的滕头村耕地面积少且贫瘠、多洼地,经济状况贫困落后。1965年起,滕头村开展了为期15年的改土造田运动,实现了粮食大增收,随后逐渐发展为粮、果、畜牧、渔、林一体的现代立体生态农业。20世纪80年代,滕头村开始大力发展工业,开办了服装厂、科技企业、生态园林企业等,逐渐形成了工农贸一体发展的企业集群,乡村“生产”空间呈现集约化态势。同时,滕头村始终遵循生态、低碳发展理念,不仅入选了1993年联合国“全球生态500佳”,而且前来参观乡村发展成果的人数逐年增长。滕头村顺势发展乡村旅游,旅游形式以步行观光和农家乐采摘等方式为主。2008年,滕头村旅游年收入超过1亿元^[31]。2010年,滕头村荣获全国首批低碳旅游品牌,获评全国5A级旅游景区。滕头村具有较为完整的乡村低碳生态系统,如街道照明“风光能”系统,生态绿地处理系统等,日常生活用水经系统处理后,基本实现了污水零排放;PM_{2.5}监测设备和空气质量监测站实时监测并公布空气质量,全村绿化面积占比达到67%^[32],乡村“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获得改善。2010年以来,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不断赋能滕头乡村空间的再造过程,乡村美好生活图景正在滕头持续绘就。

2. 成功经验

滕头村选择了自下而上的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路径,即“村级组织主动作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持续支持”。通过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低碳行动的支撑效应以及不断推进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三生融合的乡村空间在滕头持续再生。

(1)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运转是滕头村蓬勃发展以及走向低碳旅游之路的重要基础。1960年,面对村庄贫瘠的状况,滕头村开启了改造田土自救行动。同时不断与周边村庄“以地换地”,实现了土地平整、集中,此后逐渐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生态农业格局。在工业发展阶段,滕头村召回村外人才,从服装厂到科技厂,最终形成了工农贸一体的企业集群,为后续滕头发展低碳旅游奠定了经济基础、生态基础和群众基础。1993年,滕头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环境保护委员会。村委会通过召开培训会向村民讲解环境污染的后果,并外派村民代表和村干部参观考察环保地区和污染地区,最终环保发展之路获得全体村民支持。确立生态村庄发展范式后,滕头开始主动发展低碳产业,如节能环保设备、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等^[31]。1997年,滕头开始重点发展生态旅游,村委会聘请乡村旅游职业经理人,完成滕头旅游公司注册,向上争取政府支持,提升交通、服务便利度,营造文化氛围,最终成功获评5A级景区。2017年,滕头村党委主导优化了乡村旅游产品体系,改民居为民宿、打造美食街,并将农产品纳入旅游产品体系,同时取消了门票制度,仅对游乐项目收费运营,乡村旅游业产值结构持续优化,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赋能“生产”空间的积极作用持续显现。

(2)持续凸显低碳行动的支撑效应。1977年,滕头村在规划时即保留了生态区域,提出了以生态农业带动村庄发展的目标,标志着滕头村生态建设进入自觉阶段^[31]。1979年,滕头村将土地资源划分为建筑、农业和生态3种类型,并将其限制在一定区域以内,不允许随意扩张^[33]。2019年

批复的《宁波市奉化区滕头区块控制性详细规划》(JK01-08-15等地块)显示,滕头村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在规划调整后均有小幅度增长,这一调整过程也凸显了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保护生态区域的“生态”逻辑。实际上,乡村“三生”空间是人与空间、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等多维复杂关系的空间映射^[34],通过构建乡村“三生”空间规划体系^[35],使用 ArcGIS 工具及多功能评价^[36-37]等方法,确立不同功能空间边界,最终将有助于统筹乡村资源、增强比较优势以及补齐发展短板^[38]。1978年,滕头开始建设将沼气池和节柴灶相结合的乡村能源体系,如今滕头的居民生活区和商业美食街,电能炊具成为烹饪的主要用具。在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过程中,滕头村注重展现乡村的自然生态和古朴文化,修建了生态科技农业大棚,并以较低的成本将农家楼改头换面,乡村“生活”空间不断优化。此外,滕头村还借助村规民约对村民生活的低碳化进行了规范。滕头村1993年制定了《爱国卫生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卫生管理实施条例》^[31],以此提升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和村民环保知识水平。伴随上述乡村低碳行动的持续推进,滕头村村民的低碳转型意识不断强化,低碳行为偏好逐步形成,最终为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提供了关键主体支撑。

(3)不断推进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以低碳乡村旅游为核心载体,滕头逐步实现了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和乡村空间的“提质增效”,这一过程凸显了乡村旅游低碳化的“生产”逻辑。滕头村内部经营企业大多都以生态、绿色和低碳作为自身经营方向,如滕头生态酒店集团,以节能、环保、舒适、低碳为经营理念,目前已拥有4家国家五星级生态酒店、3家四叶级精品民宿。此外,滕头还成立了能源公司大力发展低碳能源,生态农业、园林绿化、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共占滕头村经济总量的80%^①,花卉、园林艺术、农业等产业既作为村内产业,又作为旅游资源,与低碳旅游有机结合。囿于村内有限的土地资源,滕头村采取了向邻村借地、允许邻村入股的方式,联合周边村落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滕头村向外拓展,打造“生态飞地”,即在村外优选环境优良的区域投资布局生态基地,并聘请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负责经营管理。通过这种模式,滕头村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合作区域及周边地区的共同繁荣。目前,滕头集团下属的滕头园林在全国多个省份建立的生态基地总面积已达10万亩左右。在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的实践场景中,滕头依托生态资源积极打造低碳旅游吸引物,逐步实现了餐饮、住宿、纪念品研发等旅游产业全链条的联动发展,并依托低碳旅游品牌效应催生形成生态产业集群,为低碳设施运营及旅游场景打造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最终持续赋能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和乡村空间的再造过程。

3. 现实问题

(1)旅游者低碳旅游体验满意度相对较低。滕头村在宣传方面数量多、质量高、体系完善,享有诸多国家级荣誉,在当地乃至全国均具有较高的名气,其为旅游者产生较高心理预期提供了外部激励。然而,滕头村在致力于构建绿色低碳乡村旅游地的过程中,其宣传的低碳环保措施与旅游者的实际体验之间存在一定的感知差异。具体而言,尽管滕头村在节能、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方面实施了诸多低碳举措,但其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旅游者可见、可感的旅游资源。相反,旅游者更倾向于直接体验其绿化景观、农家乐园等显性元素,而对那些隐性的低碳环保技术和管理体系则感知不足。根据对滕头村旅游者网络评价的分析^②,积极词汇频数占比50.2%,消极词汇频数占比49.8%,游客消极印象与积极印象基本持平,普遍反映的问题为设施较为老旧、体验内容不够丰

① 详见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722/c1008-32165523.html>。

② 本文从大众点评网、蚂蜂窝网、美团、携程、新浪微博、百度旅游等六大网站获取数据对象,共筛选出989条有参考意义的评论数据。

富等^[39]。

(2) 具备低碳属性的乡村美好生活空间呈现不足。滕头村以其乡村生态田园与梦幻江南水乡为核心特色,在构建低碳旅游场景时,注重融入和体现传统乡村文化元素,且通过演艺和体验性活动,展现了传统乡村风俗的独特魅力,凸显了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重构“乡村性”生活空间的“生活”逻辑。尽管如此,随着滕头村旅游发展的日益成熟,其商业化程度也相应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传统乡土文化挖掘的深度和广度有所欠缺。具体而言,水乡旅游景观的打造虽然极具吸引力,却呈现出向城市旅游空间过渡的趋势^[39],与游客主观构建的“乡村性”低碳旅游景观产生了一定的偏差。

(三) 路径比较

上述两个案例地的乡村旅游低碳化实践提供了“双碳”目标下乡村空间秩序重建和优化的差异化路径。坪林“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低碳化实践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基层组织的支撑作用以及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而滕头“自下而上”的乡村旅游低碳化实践则充分彰显了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积极参与的“示范效应”。两种实践模式均体现了乡村旅游低碳转型与乡村空间再造的良性互动关系,但乡村空间再造的核心逻辑则存在一定差异。

1. 乡村“生产空间”的再造

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驱动乡村“生产空间”再造的实践场景中,如何恰当选择生产空间秩序重建的“作用媒介”至为关键。台湾坪林依托低碳旅游项目和生态茶业等构筑其低碳旅游产品品牌,其具备比较优势的茶产业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推动了骑行、餐饮等乡村旅游产业的延链增值,乡村生产空间的内部秩序及其与非生产空间的互动关系也获得了相对优化。浙江滕头则基于生态农业、绿色工业以及“生态飞地”等构筑其乡村旅游吸引物,逐步实现了乡村旅游产业全链条的联动发展,持续赋能现代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和绿色转型,乡村空间的生产秩序实现了重建,生产空间与非生产空间的冲突情形也不断弱化。

2. 乡村“生活空间”的再造

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的实践场景中,致力于实现节能减碳等环境治理目标,往往需持续进行乡村社区的低碳化改造,诸如采用低碳技术、增设节能减排相关设备等,这为乡村生活空间的秩序重建和外部“旅游流”的持续吸引提供了现实基础。诸如台湾坪林通过低碳社区改造、坪林老街翻新、垃圾分类处理以及低碳教育理念普及等行动,逐步强化了乡村空间主体的低碳意识和行动自觉,驱动了乡村生活空间秩序的适度重建。浙江滕头则通过村规民约的约束、文化氛围的营造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改造,显著强化了乡村空间之于农民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载体功能,实现了乡村生活空间的秩序重建和优化。

3. 乡村“生态空间”的再造

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的实践场景中,通过原生态乡村环境修复、传统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乡村旅游产品特色和品牌记忆将获得持续凸显,有助于更好满足旅游者对乡村空间的多样化体验需求,生态空间的秩序重建也得以不断反哺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再造过程。台湾坪林实施“封溪护鱼”等生态保护计划,严格限制生态区域的土地开发活动,乡村空间的生态属性持续强化,乡村生态空间实现了重建和优化,其所蕴含的生态效益也获得改善。浙江滕头则通过精心的村庄规划与生态绿地的拓展,辅以 ISO14000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实施,持续推进了乡村生态空间的再造过程,并对乡村空间内部秩序的优化提供了激励。

总的来讲,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是基层政府、村集体、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农村居民、外部旅游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产-生活-生态”即“三生融合”的乡村空间持续再生,乡村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农民就业增收等乡村空间运行绩效多维改善的动态演化过程。这

一过程也凸显了空间再造目标下乡村旅游低碳转型路径选择的核心逻辑:结合乡村资源禀赋优势,强化“产业-组织-产品”体系,契合“三生空间”实践场景,驱动乡村空间持续再生,赋能乡村空间多维振兴。

四、结论与讨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多重背景下,作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乡村“三生”空间再造的重要载体,乡村旅游业如何有效实现节能减碳和绿色发展,并持续赋能新时代乡村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已成为重要命题。“生产、生活、生态”是乡村空间的三大基础功能,厘清生产维度、生活维度和生态维度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的潜在利益冲突,并为真正推进乡村空间中多维关系网络的耦合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秩序,其本质上也是乡村旅游低碳转型过程中实现乡村空间再造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逻辑前提。实际上,以低碳化为价值符号的乡村空间更有助于树立乡村旅游品牌,其本身亦可直接转化为乡村低碳旅游的关键吸引物,有助于强化乡村旅游者与乡村空间的多维价值认同,从而为乡村空间再造提供关键主体基础。此外,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过程中持续再生的乡村空间,也为农民就近就业创业增收提供了可能机会。凭借对乡村空间较为熟悉的优势及其衍生的其他工作便利性,乡村原有居住者往往成为乡村旅游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因此,伴随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过程的持续推进,农民等空间权益主体以及乡村等空间治理主体之间的“行动协同”,将在持续再生的美好乡村空间中获得显著强化。

通过提供低碳观光产品、开展低碳社区改造等低碳化实践,并通过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差异化的低碳化路径,台湾坪林和浙江滕头的乡村旅游业分别实现了“减碳增效”,“三生融合”的乡村空间也因之获得持续供给。在“生产空间”维度,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推动案例地乡村产业体系的低碳化变革,突破乡村产业发展困境,激发乡村绿色经济活力,凸显了“双碳”目标下乡村空间再造的“生产”逻辑。在“生活空间”维度,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推动案例地乡村生活秩序低碳化重构,改善了乡村生活基本环境,创造了乡村美好生活空间,引导村民及旅游者逐步形成低碳行为偏好,凸显了“双碳”目标下乡村空间再造的“生活”逻辑。在“生态空间”维度,乡村旅游的低碳化转型倒逼案例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规范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乡村生态效益的提升反哺乡村旅游场景打造,凸显了“双碳”目标下乡村空间再造的“生态”逻辑。因此,案例地对于乡村旅游低碳化转型的实践探索,不仅展现了社会主义大国美好乡村空间的再造过程,也为“双碳”目标下传统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品牌重建和价值再造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

参考文献:

- [1] LEE T H, JAN F H. The low-carbon tourism experience: a multidimensional sca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9(6): 890-918.
- [2] 陶慧,张梦真. 乡村遗产旅游地“三生”空间的主体价值重塑——以广府古城为例[J]. *旅游学刊*, 2021(5): 81-92.
- [3] 丰晓旭.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逻辑及关键问题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2): 305-317.
- [4] 宫海婷. “中国之治”视域下的乡村旅游业治理问题[J]. *社会科学家*, 2020(8): 57-63.
- [5] 段黎,胡伶俐,韩小云,等. 量化碳排放信息对旅游者碳补偿意愿的影响研究[J/OL]. *旅游科学*, 1-22[2024-08-16]. <https://doi.org.libproxy.v.zzu.edu.cn/10.16323/j.cnki.lykx.20240517.002>.
- [6] 李伯华,易韵,窦银娣,等.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以湖南德夯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3): 517-530.
- [7] 杨政琨,张雪松,雷自耕,等. 鄂北低丘岗地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研究——以湖北省广水市长

- 岭镇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4(6): 1354 - 1366.
- [8] 杨忍, 陆进锋, 李薇. 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多维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机理[J]. 经济地理, 2022(3): 190 - 199.
- [9] 姚尚建. 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J]. 理论与改革, 2023(2): 48 - 60.
- [10] 杨燕, 胡书玲, 王坤, 等. 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的三生空间演变及驱动机制——以肇兴侗寨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12): 222 - 230.
- [11] 武小龙. 乡村建设的政策嵌入、空间重构与技术赋能[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9 - 22.
- [12] 窦银娣, 叶玮怡, 李伯华,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7): 215 - 224.
- [13] 张广海, 刘二恋, 董跃蕾. 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3): 130 - 136.
- [14] 焦庚庚, 杨效忠, 黄志强, 等. 县域“三生空间”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及可能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婺源县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5): 1252 - 1267.
- [15] 黄颖祚, 王姗. “双碳”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时代要义及创新路径[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3): 218 - 228.
- [16] 秦晓楠, 杜雪婷, 王兴康, 等. 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的场景认知与生产机理[J]. 资源科学, 2023(12): 2400 - 2413.
- [17] 郭斯琪, 史春云, 钱月祥, 等. 旅游绅士化影响下的乡村空间重构及其驱动机制——以徐州市汉王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5): 966 - 980.
- [18] 张艺. 低碳视域下乡村旅游的功能建设与发展模式[J]. 农业经济, 2017(6): 43 - 45.
- [19] 张颖璐. 旅游开发中的乡村民宅建筑低碳化设计对策[J]. 社会科学家, 2022(2): 42 - 49.
- [20] ZHU X Q, ZHANG Z Q, CHEN X W, et al. Nexus of mixed-use vitality, carbon emissions and sustainability of mixed-use rur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Zhejiang[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2, 330: 129766.
- [21] 李广东, 方创琳. 城市生态 - 生产 - 生活空间功能定量识别与分析[J]. 地理学报, 2016(1): 49 - 65.
- [22] 汪鸿波.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58 - 68.
- [23] 马勇, 刘军. 国内外低碳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106 - 110.
- [24] 李巧莎. 日本乡村旅游模式探索及案例分析[J]. 现代日本经济, 2020(2): 72 - 80.
- [25] 黄文胜. 论低碳旅游与低碳旅游景区的创建[J]. 生态经济, 2009(11): 100 - 102.
- [26] 张圣琳. 有机坪林有机会吗? ——城乡交界“农行动”的茶乡实验[J]. 北京规划建设, 2014(4): 28 - 35.
- [27] 邓惟仁. 新北市坪林区推动低碳观光政策之研究: 永续发展观点[D]. 台湾: 台湾政治大学, 2011.
- [28] 项继权. 台湾基层治理的结构与特征——对台湾坪林乡和大安成功社区的考察报告[J]. 社会主义研究, 2010(5): 61 - 66.
- [29] 唐承财, 于叶影, 杨春玉, 等.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低碳认知、意愿与行为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4): 43 - 48.
- [30] RAFFAELLI R, FRANCH M, MENAPACE L, et al. Are tourists willing to pay for decarbonizing tourism? Two applications of indirect questioning in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21(2): 1 - 21.
- [31] 王宏甲, 萧雨林. 中国有个滕头村[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9.
- [32] 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村庄调研课题组. 从生态兴村到未来社区的滕头实践[J]. 中国村庄, 2022(4): 22 - 32.
- [33] ZANG Y Z, LIU Y S, YANG Y Y, et al. Rural decline or restructuring?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 rural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20, 94: 104531.
- [34] 江曼琦, 刘勇. “三生”空间内涵与空间范围的辨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4): 43 - 48.
- [35] 李晓青, 刘旺彤, 谢亚文, 等. 多规合一背景下村域三生空间划定与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10): 146 - 152.
- [36] 马晓冬, 李鑫, 胡睿, 等. 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城市边缘区“三生”空间划分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9): 1382 - 1392.

- [37] 安悦,周国华,贺艳华,等. 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功能分区及调控——以长株潭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4):695-703.
- [38] 周侗,王佳琳. 中原城市群乡村“三生”功能分区识别及调控路径[J]. 地理科学, 2023(7):1227-1238.
- [39] 宋楠楠,崔会平,张建国,等. 基于网络文本和 ASEB 栅格分析的宁波奉化滕头村旅游体验提升路径研究[J]. 浙江农业学报, 2019(11):1935-1944.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Path of Rural Space Reproduction Empowered by Low-Carbo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NIU Wen-tao, ZHANG Yue-qiu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ree lives space”——a framework analyzing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LCTRT)——i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Pinglin in Taiwan and Tengtou in Zhejiang a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a dual cas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is adopted to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practical path of empowering r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CTRT drives the green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resource allocation logic, guides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and obtains the “low-carbon correction” of the production order of creating products and providing services in rural space. The internal incentives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on dimension of rural spac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ultimately empowering the continuous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lict between production and non-production space is relatively weakened. Through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n rural communities, such as low-carbon living facilities and the “low-carbon” correction of the behavioral preferences of spatial subjects——villagers and tourists, the order of rural life, for example, the provision of living products, residential service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has been rebuilt and optimized. The livability attributes and its carrier’s function to satisfy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continue to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n r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and value attributes have been optimized; the external tourists and the rural multi-dimensional value has been strengthened, a “rural-oriented inflow” preference in tourism and factor flow has appeared, while ecological space reconstruction empowers the order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oduction space and living space. Through the top-down and bottom-up differentiated low-carbon paths,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goal of spatial reengineering provides a new way to build a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s; rural tourism;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major industries